

## 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对方言演变的影响

彭婷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在对湖南移民史进行了简单回顾以后,总结了人口迁徙对方言演变影响的若干因素,重点讨论了外在客观因素、人口个体因素、人口集体性对移民方言的影响,这些影响归根到底呈现出两种趋势:对原有方言的分化和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活动在影响其方言接触上的独特性:总数大,而分布时间、地点不集中;西南官话与新湘语、老湘语、赣语、西南官话的接触;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非自愿前提;多为农村移民;家族被分散。

**关键词:**三峡移民;湘方言;西南官话;方言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112-05

方言的演变除了自身发展规律外,人口迁徙也是最重要的外因之一。“历史上没有不通过移民而实现的方言传播。”<sup>[1](14)</sup>可以说,方言的演变总是在移民社会中完成,并不断进行新的更替。移民和迁入地居民是方言接触的主体对象,如果能详细描述并记载他们在某个或多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情况,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人口迁徙是如何对方言的演变起作用的。

湖南境内方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都是基于方言各层次的实地调查。在方言的历史变迁的研究上,仍然缺乏静态描述的专门史料,因此要讨论湖南人口迁徙对方言的演变情况,将面临很大的困难。而2000年开始的三峡移民工程中,有部分外迁移民搬至湖南,他们的方言演变进程如何呢?他们的语言交际状况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这正是一个对移民方言状况历时研究的良好契机,也是一项长期调查的起点。本文试图通过湖南境内几次主要的人口迁徙情况,来归纳人口迁徙影响移民方言的一般性要素,以及作为人口迁徙的主体,同时作为语言接触的一方,入湘三峡移民与一般移民相比有何独特性。

成。”<sup>[2]</sup>同样,湖南历代的入境移民,不仅导致了湘方言的诞生,而且对其境内方言的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

鲍厚星先生在谈到湘语区的形成问题时,也没有避开湖南历代的移民史,尤其是外地移民的影响。“五代以前,湖南的外地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的外地移民多来自东方。”<sup>[3](119)</sup>他对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提出了湖南移民史的分期:北方移民的三次浪潮分别发生在永嘉年间(307—312年)、安史之乱以后和靖康之乱以后。这些移民的迁徙浪潮前后波及了今湖南境内的安乡、澧县、华容等北部地区,湘中、湘南(如道县西),以及洞庭湖西北岸的常德、澧县一带,“不仅在湖南境内沅、澧二水流域形成了北方方言(即西南官话)地区,也对湘语尤其是湖南北片的湘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sup>[3](119)</sup>东部江西移民在五代以后大量涌入湖南,分别经历了“纯江西时代(五代至北宋)”“初期混杂时代(南宋至元代)”“大混杂时代(明代)”“转变时代(清代)”。因此,赣语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在湘东由北而南形成狭长的赣语区,或是在湘中、湘西南等其他地区留下了赣方言点……或是让一些其他地点方言带上了不同程度的赣语色彩……同时,对于湘语内部形成清浊两大分野,赣语也有相当的影响。”<sup>[3](122)</sup>

湖南境内的移民,其主体仍然是农业移民。从人口学上看,他们的迁移模式主要有两种:国家组织的移民活动和民间的自由迁移。不管哪种迁移模式,往往都带有“趋食性”和谋生目的,对于从迁移后的地

收稿日期:2006-04-03

作者简介:彭婷(1983-),女,汉族,湖南湘阴人,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区得到更充足的土地资源,创造更丰厚的物质财富,怀有很高的期待值。

## 二

社会的流动,人口的迁徙,带动着方言始终不断变化发展。把语言接触的双方分开来看,一方面,迁入地方言在移民浪潮持续有力的侵蚀下会渐渐演变。葛剑雄先生在《研究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中提到这种现象,他认为移民对迁入地方言的影响有四个主要因素:移民的数量,集中程度,社会地位,移民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言间的差异。当然,除了这四个方面,我们还能看到,如果当地居民的个体有着统一的主观意愿,并且不断膨胀,就很可能对移民的外来方言起到抵触作用。

另一方面,移民客居他乡,受到迁入地方言的影响更大,影响的方式也更为复杂。首先,外在的客观因素通常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移民居住的集中程度等。从宏观上说,迁入地的地理状况和交通状况决定着迁居而来的移民与当地居民或者外界的接触程度。湖南的客家话分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湖南境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罗霄山脉和南岭沿线地区。这一地理分布上的特点奠定了湖南客家方言演变的基本方向。”<sup>[4]</sup>同时,由于客家人迁到的山村交通落后,与非移民来往极少,这种封闭性和保守性也使得客家方言得以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其次,移民个体因素如年龄、职业、性格、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年龄越小,学习方言的能力越强。职业性质和性格特征又决定了移民与外界交流的多寡,自给自足的农民或内向沉默的人就明显少于接触,对自己方言的保护性就越强。开放式的教育或者落后于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都有利于移民主动放弃自己方言转而学习迁入地方言。第三,移民集体性的影响有时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主要表现在移民家族、家庭的方言情感及其对移民的制约。还是以客家人为例。客家人对内历来有着非常严格的家族规约,“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不但要求客家人坚持说客家话,而且要求新媳妇在进门后几年内必须学会客家话,对于外嫁的女儿和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客家人,他们回家探亲也必须说客家话。如果不说,就指责其“忘了祖宗忘了本”。家庭对多种语言的选择情况也是一种方言情感的暗示。如果在移民家庭中都不使用自己的方言,则可能把移民方言的语用价值降到最低,从而导致它的最终消失。

总之,不论是迁入地方言还是移民方言,在接触中的相互影响无非来自于两股力量:一种是分化其原有方言的势态;一种则对其原有方言进行保护。而两种方言的演变方向也正是这两股反向力量同时作用的合力。入湘三峡移民虽然搬迁时间不长,方言的演变并不明显,但人口迁徙对移民方言的影响也有着上述一般性的规律。

## 三

入湘三峡移民具有移民的一般性特征,但是和湖南历代移民事件相比,在新的时期又有其独特性。这也为移民方言的演变增添了不少新的因素,成为影响其方言演变的新的前提,对方言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方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一) 总体数量很大,但在分布时间、分布地点上都不集中

从2000年至2004年,三峡移民迁入湖南的人数共达7466人。但是,这批移民分两批四次先后迁入,在时间上并不集中,因此语言的适应和融合状况也各不一致。同时,移民在湖南的安置地包括8个市21个县(市、区)的98个乡镇,在湘东、湘南、湘北、湘西南、湘东南均有分布。即使在一个乡镇,移民也被安置在不同的村、组。入湘三峡移民基本采用集中安置和插花安置两种方式。集中安置人数最多的在郴州市苏仙区,共706人。插花安置的原则是每组2户以上,5户以下,大部分移民采用插花安置。

由此可知,入湘三峡移民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分布时间先后相差达5年,分布地点纵横整个湖南境内。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不集中,使得各个安置点的移民基本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移民方言也处于劣势地位,被分化的可能性也越大。

### (二) 西南官话(劣势)与新湘语、老湘语、赣语、西南官话(优势)接触的情况

入湘三峡移民来自重庆忠县、万州、开县的各个乡镇。根据杨时逢先生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把这些移民的迁出地都划为西南官话区,笔者在各地取样调查的移民方音系统也证实了这一划分。而迁入地的方言也正好是湖南主要方言区域的代表:湘语北片(如汨罗、益阳),湘语南片(如涟源),赣语区(如攸县,醴陵),官话区(如郴州)。也就是说,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方言接触,实际上是西南官话与湖南境内各方言区域代表点之间的接触。

在这样的方言接触中,移民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

言差异的大小就十分重要了。双方方言“差异越大,语言上的冲突越激烈,不是‘你死我活’,一种方言消灭另一种,就是势均力敌,长期并存。而在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相互影响,使原有方言发生微小、缓慢的变化”<sup>[5](89)]</sup>。不仅迁入地原有方言的演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移民方言同样如此。差异如果很大,语言冲突严重,移民方言作为劣势语,很可能被消灭,或者在有限的几代移民内部尚能与优势语“势均力敌,长期并存”,但渐渐将使用范围缩小到家庭语言中,最终因失去语用价值走向消亡。如攸县、涟源等地,与移民的西南官话差异太大,移民难以适应,甚至开始反感,认为当地话不好听,不文明,评价很低。同时,对当地话习得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攸县为例,在接受调查的111人中,仅有5人表示现在能完全听懂当地话,年龄全部在18岁以下,表示完全听不懂的还有24人。

另一种情况,如果差异较小,如衡南话中就有很多西南官话的成分,郴州话本身就是分布在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区。此时移民与当地居民基本能够通话,语言障碍并不大,只须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做细微调整。比如移民会主动学习当地对农事的称呼和对亲属称谓的称呼。衡南县三塘乡被调查的32人中,有28人表示能够完全听懂或者听懂一大部分当地话。

迁入地方言的情况越复杂,与西南官话的差距越大,可能对移民方言的破坏性越大,也可能使得移民无法学会优势方言的情况下,干脆坚持自己的方言,拒绝学会迁入地方言,反而对移民方言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在这一演变要素中,分化力量和保护力量是同时存在的。

### (三) 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

推广普通话是湖南移民史上从没有面临过的新背景,也使得对入湘三峡移民的语言研究具有新的意义。从最初形成到现在的方言区域划分,湘方言受到北方官话和赣语影响是最深远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在湘西、湘西北和湘南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西南官话区,在东部与江西交界的连绵地带以及内部的新化等地,形成了大批带有明显客赣成分的方言。而普通话通过政府行为和教育行为基本得到了普及,官话在持续不断的侵蚀着湖南境内的方言,使其面临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渐渐模糊其原有特征,接近普通话。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一方面,由于西南官话与普通话基本接近,当地居民可以很轻松地接受,同时还可能借助普通话的“时尚”,侵入到当地居民的语言中。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鲁国尧先生就在《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中指出,永嘉之乱后,“成

千上万的北人涌进了吴语区和楚语区的北部”<sup>[6](70)]</sup>,这批人携带的是当时在全国享有权威地位的洛阳话,使得新居留地的土著居民纷纷效仿,“《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在建康,百姓说吴语,而士族与官员则说南方通语”<sup>[6](71)]</sup>。这也导致了今天在南京和湖北大部分地区以官话为主的面貌。另一方面,普通话很可能成为一种双方妥协的方式被同时接纳。普通话不仅是大家能够共同使用的通语,而且在各方言区都作为一种“更文明、更好听、更亲切”的语言被更多的人接受。在“推普”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之间使用普通话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尤其集中在年轻人中,或在学校、银行等一些服务性或赢利性机构。因此,不管是移民还是当地居民,方言情感已经被淡化了。

调查数据表明,移民在迁移前后,普通话的使用次数增多。迁前基本不说普通话的有55.1%,迁后只有14.4%。同时,说普通话的水平也有了提高。认为自己说得流利或比较流利的人,由迁前的31.5%上升到迁后的67.1%。尤其是在方言差异较大的一些地区,普通话更显示出它强大的可行性。

### (四) 非自愿前提下的语言接触

三峡移民工程是政府出于国家公共建设需要,运用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并且强制推行的,因此三峡移民是非自愿性移民。他们对于安置地的环境,包括语言环境在内,都没有充分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在这种非自愿前提下发生的语言接触,大多数客观因素具有不可动性。如迁入地的自然条件,语言差异,经济状况等,而移民个体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尤为凸现。尽管移民很愿意保留自己的方言,但是由于严重失去了方言优越感,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学习迁入地方言。移民的语言习得过程中,能否主动积极地学习,对当地方言或高或低的价值判断,学习途径的多寡,这些都根据移民的个体差异而各不相同。调查中,认为当地话好听的占总人数的7.76%,这些人的年龄集中在18岁以下,或者文化程度较高,或者是从事一些相对开放职业的人。相对应的,这批人能够听懂并且说当地话的程度明显要高出其他人。在这一演变要素中,分化还是保护,取决于移民自身对迁入地方言习得的态度。

在湖南移民史上,非自愿性移民不在少数,他们的方言是如何渐渐适应的,我们已经无法从史料记载中得知。但根据对入湘三峡移民现有的方言习得态度的调查和统计上,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种差异很大的方言要实现融合该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对于移民本身又是一个多么矛盾而痛苦的历程。因此,在对移民

的安置和措施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更多方言适应的因素，减轻移民的方言压力，使方言的融合有更多的“软着陆”。

(五) 多为农村移民，社会、经济地位不高

入湘三峡移民基本全部是农村移民，社会地位不高，没有掌握多少文化、经济权力，也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因此对迁入地的社会影响较小，不会像永嘉乱后的人口南迁那样，虽然同样是政府性移民，但后者的移民人口包括了大批贵族甚至帝王、官吏、文人以及随同的艺人、工匠、商人、将士、奴婢等，对迁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

三峡移民在与迁入地的融合过程中，无论在经济、社会地位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处于劣势地位，都处于外界力量的强大包裹之中。仅从文化程度来看，被调查的 219 人中，小学或小学以下的有 124 人，占到了 56.62%，而高中或高中以上的仅 21 人，不到 10%。迫于生存压力，或者出于对强势方言的羡慕和掌握强势方言的强烈愿望，他们会采取主动迎合的姿态来学习迁入地方言，有些甚至会自己或在下几代中放弃原有方言。因此，在这一演变要素中，分散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

(六) 搬迁时家族被分散，可能存在的家族规仪被人为打破

入湘三峡移民区别于以往的移民运动，最大的特点就表现在其家族被人为分散。历史上的人口迁移通常带有“趋食性”和谋生目的，因此一般都是携一家老小共同迁移。不管是灾荒、动乱或者其他异常社会原因造成的民间自由移民，还是国家组织将“狭乡”人口迁往“宽乡”，大的家族集体迁徙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他们在迁徙流亡的过程中，经常携带着固守的家族规仪，对移民成员内部加以制约。而三峡移民不同，政府对三峡移民的安置是有策略性的。移民们的分布在地点上和时间上并不集中，往往大的家族被分散：一部分仍在老家，一部分在移民地，或者一个家族被分散安排在几个不同的移民地。家庭规模减小，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劳动互帮关系、邻里关系等都被打破。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带来的后果是“家族关系和宗族组织被打破，传统的家族文化缺失”。何泽仪等在《三峡移民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一文中对岳阳地区新市镇和杨林乡两地部分三峡移民的调查，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见表 1)。

家族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本来有着巨大制约性的家族规仪烟消云散，除了对个别成员有着心灵上的自觉约束外，已经无法形成一种集体压力来强行保留移民方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家训也遭到了破灭。在没有强大的家族管束的情况下，三峡移民

的方言失去了保护力量，随着外部接触状况，遵循语言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开始更加自由地演变。在这一演变要素中，分散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

表 1 岳阳地区新市镇、杨林乡部分移民家庭规模及结构

|         | 新 市   |       | 杨 林   |       |
|---------|-------|-------|-------|-------|
|         | 移民前   | 移民后   | 移民前   | 移民后   |
| 调查户数(人) | 7     | 7     | 14    |       |
| 家庭规模(%) |       |       |       |       |
| 3~5 人   | 42.86 | 71.43 | 35.71 | 71.43 |
| 6~8 人   | 42.86 | 28.57 | 57.15 | 28.57 |
| 9 人以上   | 14.28 |       | 7.14  |       |
| 家庭结构(%) |       |       |       |       |
| 单人家庭    | 0     | 0     | 0     | 0     |
| 核心家庭    | 42.86 | 57.14 | 50    | 78.57 |
| 主干家庭    | 57.14 | 42.86 | 50    | 21.43 |

注：单人家庭，即一个人独居；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及未婚子女共居；主干家庭，即两代以上的夫妇共居。以上夫妇亦包括其中一方残缺的情况。

四

在移民史的研究上，语言学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通过对方言区及亚区的考察来“复原历史时期移民活动的若干片断”<sup>[5](90)</sup>，“在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方言往往能成为确定某次移民运动是否存在，移民来自何处，何时迁入等问题的重要证据”<sup>[5](90)</sup>。反过来，同样能够通过研究移民活动的情况，解释和判断方言形成的源流和方言间的关系。

但是，移民活动并不能完全决定方言的形成，“方言格局与移民分布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sup>[1](114)</sup>。这也是在对三峡移民语言使用状况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的一点。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湖南的湘阴，是赣语从北路侵入湖南的第一站。江西移民占到外来移民总数的 72%，但是，湘阴的主要方言仍然是以湘语为主，“赣方言特征仅能与湘语相颉颃”<sup>[7]</sup>。这种情况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共识，李蓝在《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中，就坚定地认为“历代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什么样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单的”<sup>[8]</sup>。移民与方言分布可能形成的不一致，就是由方言接触的主体因素造成的。

参考文献：

[1] 张伟然. 楚语的演替与湖北历史时期的方言区域[J]. 复旦学

- 报(社会科学版), 1999, (2).
- [2] 王士元. 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断想[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 1994, (3): 58.
- [3] 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4] 陈立中. 湖南客家方言演变原因探析[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3): 123.
- [5] 葛剑雄.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J]. 杭州: 浙江社会科学, 1997, (4).
- [6] 鲁国尧. 鲁国尧自选集[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1999.
- [7] 周振鹤. 游汝杰. 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J]. 方言, 1985, (4): 272.
- [8] 李蓝. 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J]. 语言研究, 1994, (2): 72.

## The impact of *Three Gorges migrants*' migration into *Hunan* province on the evolution of dialects

PENG 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fter a simple review of *Hunan* immigrants' history, the author summed up a number of factors about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dialects' evolvement,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discuss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external objective factors, the population individual factors, the population collective on the dialect. And these influences finally present two kinds of tendencies, polarization and protection. What's more, it discussed the unique dialect of *Three Gorges migrants*' movement activities. For example, the gross population is big, while distribution time and place isn't centralized; and such changes as the contact with Xi'nan mandarin, new Xiang dialect, old Xiang dialect and Gan dialect; the big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standard spoken Chinese; non-voluntary premise;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countryside immigrants; the family is dispersed.

**Key words:** *Three Gorges migrants*; Xiang Dialect; Xi'nan Mandarin; development

[编辑: 汪晓]

(上接第 96 页)

## Appraisal of Qian Mu's view of Chinese cultural superiority

CHEN Shugu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u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Qian Mu was an outstanding historian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He was a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that exerted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culture was superior to others in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occurrence, time and space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expansion, cultural characters, cultural assimilation, cultural live-force, the science of history and so on. This article primarily comments upon Qian Mu's thoughts of Chinese cultural superiority.

**Key words:** Qian Mu; cultural outlook; cultural superiority

[编辑: 颜关明]